

张介艺术纪念馆系列丛书

张介



ZHANG JIE
岭南美术出版社



张介



张介艺术纪念馆系列丛书

Z H A N G J I E

吴锦荣 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介 / 吴锦荣编.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62-3925-8

I. 张… II. 吴… III. 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8725号

顾问: 邬敏艺
主编: 张新杰
副主编: 何鸿佳
责任编辑: 吴锦荣
责任副编: 符学成
责任编辑: 王新华
责任技编: 钟智燕
封面、平面设计: 岑可
文案整理: 王恩元
付建中
图片整理: 伍学文

张 介

吴锦荣 编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4.5
印 数: 1-1500册

ISBN 978-7-5362-3925-8

定 价: 200.00元

目录

自序	/ 2
艺术人生	/ 4
教育培训	/ 18
艺术创作	/ 31
张介轶事	/ 42
鸡	/ 56
动物	/ 98
鸟	/ 108
鱼	/ 124
花卉	/ 134
山水	/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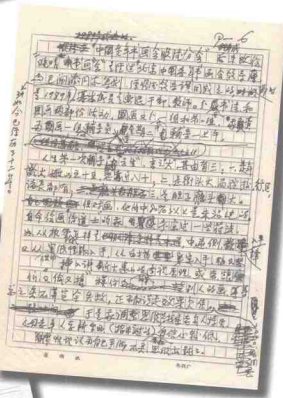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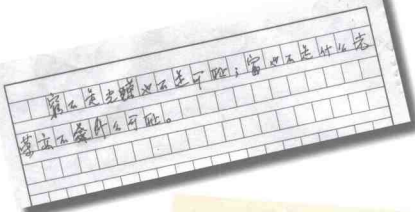
水乡	/ 166
人物	/ 182
小品	/ 186
油画	/ 194
水彩	/ 196
速写	/ 204
印章	/ 220
年表	/ 228
后记	/ 229
编者的话	/ 230



自序

自序

我是老父，是个矮老头。作品是小儿，怎会高大威猛！可喜的是它们完全似我，而且都有胎记证明是亲骨肉，这是何等重要。





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

张 介

1925年早春二月的一个凌晨，在我来到人间的一刹那，还是严寒的天空中刮着海风，下着大雨，家人在忙乱中忘记把养在天井里的鸡遮盖好，结果十几只鸡都冻死了，这事情是日后母亲对我说的，那时我才4岁，但对这些被冷死的鸡的惨状却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这也许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对鸡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吧！

我祖父是商人，颇有家业。祖母四人，叔伯、姑妈、姑姐十多人，后祖父死，各长辈们为争产业，争闹不休，经过一场诉讼，终于四分五裂，各散东西，家道从此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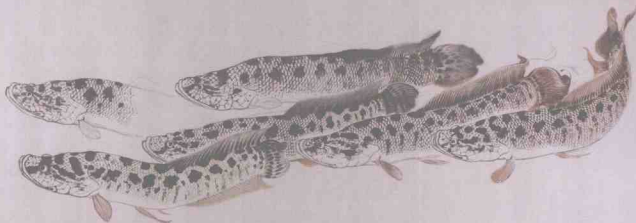
我父亲张励石，香港“圣士提反”学校毕业，长于理、化、英文。能阅读原版英文科技书。但性格懦弱，书生气十足，是个教师。假日闲时，也喜写书画，国画、油画都会写，这是我最好的亲近他的机会。因为喜欢看他写画的只有我和我二哥，其他家人都是不闻不问的。父亲较好的朋友是黄小范、黄君璧、郑可常来看望我父亲（黄小范、黄君璧，著名的岭南画派画家，与高剑父齐名。郑可：中国著名雕塑家）。那时我们住在广州荔湾，一同去大坦尾荔枝林吃狗肉，我和二哥是“候补委员”，其他人是“无份”的，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手稿



未完成作品



未完成作品



张介青年时像



张介先生(左一)与空幼教员同学在一起



张介先生(左一)与空幼同学在一起

我母亲黄复初，也是香港“圣士提反”学校的学生，初中毕业。在我印象中，她刚毅、有爱心、勤劳、节俭，父亲在生时，她在家操持家务，带着七个子女，督促他们学习。我父亲早逝（去世时才四十多岁），家庭重担就落在母亲的肩上，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长大成人。所以我一生中，欠母亲最多。在七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六，在广州市立49小学读一年级，每天学校布置功课，抄一遍书、两篇大字，母亲督促我完成，还要我每天画一张写生画，还要照顾弟弟老七，画公仔给他看，那时我和一般小孩子一样，爱画公仔，画武侠打斗的公仔。可惜弟弟天生没有艺术细胞，经过我长年对他的熏陶，到小学毕业时，他对我说“画画有×用”。

我祖籍广东顺德黄莲冲口人，但出生于广州，童年在广州生活，家居荔湾区，那时广州郊区实际上也和农村差不多，门外田野，河涌、绿树、小艇，南国水乡的美丽大自然景色，对我后来的画风有很大的影响，我生性活泼爱动，上树捉鸟摘果，游泳、摸鱼捉虾，样样精通。我更爱画画，小学二年级我转到“仁威小学”读书，美术老师是个肥亚嬷，教全校的美术课，可能在她眼中，我的画真画得好吧，她是喜欢我的，记得有次，图画课画两支铅笔，我见她范画里的两支铅笔画得太短，我认为不合比例，于是按真实的比例把两支铅笔画长，看了我的作业，老师很高兴，认为我比六年级的同学画得还好，叫我给六年级的同学上一堂课，画给六年级的同学看。

因为那时年纪太小，家中是否有什么“祖传名画”是不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幅四屏，大概是春夏秋冬吧，也记不得是什么人画的，但在父亲死后，为了维持生计，什么都变卖光了。

1938年，广州沦陷，这时我十一二岁，我记得日军入城前夕，国民党为了延缓日军进城炸海珠大桥，爆炸声震天巨响，市民不知情以为日军来了，争相逃难，其中有人挤迫死伤，情形凄惨。

广州沦陷后，我家的生活更加困迫了，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看到日军对我们人民的压迫和残害，使我难以忍受，有几件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件是日军在每个街口都用木栅缠上铁丝网封住，只留容一个人通过的出入口，旁边几个日军守着，凡中国人通过，都要验看“良民证”，搜身要对日军鞠躬，否则轻则被打耳光，重则拉走，后果更惨了，有些人甚至从此不知下落。第二件是有次据闻是日本天皇生日，日军的军车、坦克车在市内巡行，突然间宣布戒严，这些车都停下来，从军车上跳下很多日军，闯进附近的民居，三几个守在门口，其余的进入抢掠、强奸妇女，戒严结束后，这些日军走了，这些民居内都传出阵阵嚎哭声。第三件是对儿童的

摧残，日军将一些在校读书的华人儿童强迫拉入日军办的军事小学，将北方的儿童拉到南方入学，南方的儿童拉到北方入学，在读书期间受日军军训，一律要讲日语，不准讲中国话，否则受罚，进行奴化教育。我还见过日军处决中国人，用军刀杀头……这些童年印象，都深深植入脑海中，久久不能忘却，直至今天。这也许就是我一直憎恨日本军国主义、憎恨侵略者，企盼祖国的强大，热爱繁荣昌盛的中国思想基础吧。

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办了一些儿童教养院，全国由宋庆龄主持，各省由省政府协办，经费来源于爱国华侨捐助和各地政府部分的支持，目的是抢救和保护战区和沦陷区的儿童。广东的儿童教养院由广东省儿童赈济会主办。那一年，广东抗战前线在曲江，国民政府组织“抢救队”偷渡日军封锁线（那时，日军用炮艇封锁了曲江，抢救队划着小艇，用手电筒为信号，等日军炮艇一开过，立即通过封锁线）将广州近郊花县附近的部分沦陷区儿童送到后方的儿童教养院。

在广州沦陷半年后，我独自离开广州，来到了广东儿童教养院。我还记得进入教养院门口，有4个大字“家、校、营、场”，这就是教养院的办院宗旨，要将儿童管起来，进行教育，养活他们，保卫他们。

我在广州，只读了两年小学，就因家境和沦陷没有读下去了，到了教养院，我跳级读五年级。

教养院的老师大都是年轻人，他们的薪俸也很微薄，但他们爱家、爱国，所以工作充满热情，他们很爱学生，和我们同吃同住，关系很好。我的班主任姓张，是美术老师，他的父亲被日军杀死，所以他特别憎恨日本侵略者，我见他在枕头上写着“毋忘杀父之仇”几个字。可能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我们关系特别好，他将我当作小弟弟对待，经常带我去村头小巷画抗日宣传画，画在墙壁上，用石灰打底，用红泥开石灰水来画，画出红色线条的单色画，雨水也冲刷不去，张老师和我们两人，画了一幅又一幅，画这些大幅的壁画，为我以后的画画打下了基础，张老师是我很好的启蒙老师。

在教养院我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梁士斌，他也很爱画画，他的默写能力特别强。我和他经常一起外出写生，肚子饿了就偷花生、蕃薯吃，记得抗日战争期间广东省第一次小学美术比赛在曲江举行，教养院派了三位同学参赛，我和梁士斌都是代表，比赛分三轮，首先是速描、静物写生，第二是记忆画，一枝步枪、一顶头盔，看五分钟后收起，大家默写出来，第三轮是自由画，不限题材形式，大家自由发挥，我画了一张水乡景色的国画，小桥、柳树、小艇，都是常见印象深刻的东西。比赛结果：梁士斌得



张介先生夫妇与爱孙在一起



张介先生与“老”学员在一起



张介先生与友人相聚



张介夫妇的神会



走亲戚



示范



义卖

第一，我得第二，我们教养院获得团体亚军，奖了一面锦旗。

我在教养院读了三年，粤北紧张，日军逼近曲江，我五姐在曲江附近的河西医院做护士，姐夫在桂林，河西医院要迁往大后方，我五姐辞职带我离开教养院去桂林，那年我14岁，到了桂林，起先我五姐带了我的美术作业去见广西省立艺专的老师，想我在那里读书，但因年龄太小不成功，后在报刊上看到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招生，学校在四川灌县，校长是蒋介石，当时因为生活问题，要找出路（军事导校是全免费的），另外年纪小，也有一点的抗日报国的思想，所以就考进了这所军校，在校读了大约4年，因为忍受不了国民党军校的近似法西斯的纪律约束和接受不了他们灌输的法西斯独裁教育思想，结果违犯校规，记三次大过，两次小过而被赶出学校，（记得最后一次犯规是因和区队长顶撞，差点和他打起来）。

在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期间，虽然我在军事知识、军纪上无甚长进，但在艺术上却有很大进步，为以后艺术上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有位同班同学梁器琦（后为广州美院教授，现退休），他也很爱画画，他的素描基础特别好，由于我们有共同爱好，所以关系特别好，在艺术上，在生活上他都对我帮助、照顾。我被学校开除的时候，因为生活无着，一度曾考虑投靠其他军校，但梁器琦对我说：“你的画画得好，基础好，你的前途是美术，你的性格不喜欢受约束，不要再考军校了，我也准备离开军校了，到时和你一起回广东考艺术学校吧！他介绍我到都江堰“二黄庙”去住，那里食宿费便宜，还介绍我到温江县震子小学教书。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到了震子小学，教体育、美术，因为薪俸微薄，校长是同学的父亲，为了照顾我，还让我到方府挂名兼了份户籍员的工作，在那一年，我18岁，我在震子小学大概教了大半年吧，等梁器琦同学离开空军幼年学校，我们就一同回广东了。（要离开空军幼年学校，有两个途径，一是违反校规被开除，二是身体条件不合要求，不能成为一名空军。梁器琦想走的是第二种途径，在定期举行的一次体检中，他将一些湿石灰贴在肋骨上，上面用衣服遮住，在照X光时，胸部就出现一团黑暗，医生诊断是肺结核，按当时条件，有这种病是不能当空军的。梁器琦同学就顺利地离开了军校。）

我在空军幼年学校期间，参加了一个美术爱好者的组织——“虹社”，梁器琦是“虹社”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学校的三位美术老师：谭学楷老师（早年四川省立艺专教授，解放后曾任四川省美协主席），谢少白老师（徐悲鸿的同学），穆忠良老师（四川省立艺专教授，尤擅长水彩），为骨干，对我们进行辅导，同学中还有一位周思成同学（解放后任浙江美院

教授，已退休），参加虹社的大概有十几人。我们利用周日和其他假期，经常一同外出写生，或互相观摩研究，或搞画展。在有老师指导，同学互切磋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开心，画技也大有提高，我在这段期间，在艺术上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我被开除后，到了“二王庙”居住。生活这段时间，还经常利用空闲，到处外出写生，尤多画水彩，后来我画水彩画的基础是这个时候打下了。

我离开空军幼年学校后，听说不久“虹社”就被学校勒令解散了，据说在虹社的领导层中，还有中共的地下党员，“虹社”实际上是一个进步的青年组织。

1945年，日本投降。我这时刚离开空军幼年学校在震子小学教书。不久，梁器琦同学也偷偷离开了空军幼年学校，来到“二王庙”找我，决定一起返广东，报考艺术学校，走画画的路。于是我和梁器琦，还有一位也是喜爱画画的同学，一行三人便一同离开四川，准备经广西返广东，因为缺乏路费，一路上背着简单的行李，有时搭顺风车，有时步行，走到重庆已经把路费用光，只好变卖身上稍为值点钱的衣物，就这样，半饿半寒地终于挨到了桂林，那时候我们脸容消瘦，衣衫褴褛，身上也都长满了虱子。

到了桂林将军桥，找到了广西大学，梁器琦的姐夫是广西大学校长，姐姐是广西大学教授，我们就在广西大学住了下来，梁器琦的姐姐、姐夫对我们为了追求理想，不怕吃苦，敢于进取的精神很赞赏，建议我们留在广西大学，读语文系，可以领取奖学金，但梁器琦同学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走画画的路，最后我们还是谢绝了他姐姐、姐夫的好意，决定返广东。在广西大学住了一个多月后（住在校长室里），我们离开广西大学，我独自回广东，为了筹集路费，我写信向二哥要了10元，但仍不够，梁器琦就到市场卖了自己的几件衣服，将钱给我做路费，当时从桂林到广州，必须从湘桂路到衡阳，再转车走粤汉路回广州，我到了衡阳，火车票突然涨了一倍，还差一个大洋才能够买到广州的车票，只好卖了自己的外衣和一支大卫墨水笔，才够钱买票回广州。

回到广州的家（华桂横街19号）见到母亲，很开心，但看到自己离家将近十年，而今一事无成两手空，也很觉惭愧和彷徨，后来，将几年来的情况和自己想学美术的理想对母亲说了，母亲也很理解，很支持。另一方面，又将她毕生的血汗——几只金戒指（在广州沦陷8年中，母亲在医院做洗衣工，将日常生活剩下的钱攒起来，因为怕货币贬值，就先后买了金戒指存起来）卖了，供我读书、学画。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感到自



寻找素材



也当模特



辅导



相守



除恶



榕树

已负欠母亲最多。

回广州不久，在街上看到广东省立艺专招生的广告，招收国画班预科新生，本科插班生。还招收西画班、雕塑班、图案班等。我决定报考国画班。当时招本科插班名额只有两个，但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报本科插班。结果40个考生中，就录取了我和巫峡两人。

当时，艺专的校长，是高剑文（岭南派名画家，早期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党员，临解放到了香港生活），老师是关山月、黎雄才、蔡迪之等。教导主任是陈达人（油画家）。同学中记得的有陈洞庭、杨之光、陈金章。在顺德的有巫峡、徐丹、陈东波。

这时是1947—1948年，广州临近解放，市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因此，这也可能影响到学校的教导环境与情绪。我印象中，艺专的学习纪律并不好（这期间，梁器琦也曾入艺专读过几天。就因为校风校纪不好而退学），学生要学习必须靠自觉，我在艺专主修国画也选修水彩，有一次学校办水彩画展，在展出的60张学生作品中，我的作品占16张，我还记得巫峡的素描成绩比我好，习作、考试往往都比我高2分，在艺专期间，我还经常利用各种时间，外出写生，写素描、写水彩、写国画。不过总体来说，对我在艺术上的成长，影响最大、基础打得扎实的时间，并不是在艺专，而是在四川空军幼年学校这段期间。

临毕业，已接近解放，校内一片惶乱，毕业证书也发不出，只发了一张证明。

1949年，我在广州市立艺专毕业后，做了几年教师，1954年回到故乡顺德，仍在石洲小学教了一学期。1954年秋接到教育局通知，要我到县工会报到，工会安排我在宣传科。隔了一夜，科长告诉我，现在有关绘画的宣传科很多，但急需要搞的就是为吴群同志（容里丝厂车间主任）首个全国劳模搞一套连环画，介绍她的先进操作法，特别是“索理绪”的先进技术。让我先下厂体验生活几天然后回工人文化宫创作。

第二天的早晨，背了背包到容里丝厂开工了。到步后把介绍信给基层工会并说明来意，片刻基层工会主席介绍我认识吴群同志，几句日常生活和工作闲聊后，我立刻提出要求让我画她一个速写像，为了工作她没有推辞，这算是完成我第一步工作。后来到缫丝车间参观，缫丝中什么是索绪，这还容易理解，但怎样是好，怎样是坏，真是天晓得。最后还是基层工会主席——指导才叫明白了。

《吴群》是一套事迹加图解的三十幅的连环画，我下厂七天才完成了，自报60分。可是自己在绘画思维中算是初步理解生活和艺术的血肉相

连。不留意生活，你能写出些什么？

宣传科长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对问题想得细且深，更重要是有新意。有一次他对我讲：以你一个人能做多少工作？我建议你还是到基层找助手。其实也正中我下怀。于是我不断下厂，穿梭游说办宣传训练班，说真的就是美术组。因为是业余的不碍生产，基层工会是欢迎的，所以50年代我在顺德丝厂、建德二厂、顺德糖厂、7817工厂、毛巾厂、龙江丝厂、水藤丝厂……都办过为时或长或短的美术训练班。

由于工人只有晚饭后是业余休息时间，我就抓紧在就寝前这点时间。由于我是个绘画的瘾君子，只要不是文化宫开放时间，我晚饭后就骑自行车下基层，从没有被风雨阻碍，一次冬夜，从7817厂回大良，雨很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单车又每十五米脱链一次，又没有车头灯，从飞鹅山过安利农场的山边路和田基，泥泞直浸到脚肚，只好车骑人。我和几个学员被折腾一番，大家的耳朵和鞋窿都满是水，寒冬冷雨令人抖颤，但工人热爱绘画艺术的心，一直暖透我的胸膛，还丰富了我对绘画的观点：大众艺术化比艺术大众化更能推动绘画的发展。

1955年，容奇工人文化宫落成，县工会派我在这里工作。我兴奋极了，把故里发展成一个绘画之乡应该说物质基础具备了，有了房舍，亦能在开支作专项的计划。我和文化馆的陈东波同志联系，组织美术作品准备在文化宫揭幕时以“顺德县工农美术作品展”命名的顺德县解放后的第一次美展。展品作者有卢传远、何磊、陈可添、余曼陶、罗中、陈东波、陈浩天、梁重培、李和世、巫峡、梁绍深、伍嘉陵、周永韶、张汉臣、罗汉荣、何堂……等三十多人。展览后，作者相互间的联系多了。1956年便成立顺德解放后的第一个画会，“顺德工农美术研究会”。会员是参加过美展的同志。说真的，年轻时候觉得搞绘画活动比吃饭还重要。在文化宫的阵地活动中不断地办了职工家属美术学习班，职校教师美术宣传训练班。最具规模的一次是与文化馆合办的学员脱产40天训练的“工农美术训练班”。这次办班对当时农村的美术活动起到种子的作用。办班后，班里的成员曾参加首届省、市职工美展，在美展中顺德籍的职工获得两个一等、一个二等、三个三等奖。

故乡顺德，无处不是弯弯的流水，明静的曲巷、润泽的沃土、翠绿的桑田。串串露珠镶嵌在蕉叶，一抹斜阳投影在塘心，还有被古榕环抱的人家，全都是难求的水彩画素材。怎能教我不爱它？1956年到1957年间，我就以它们为对象，写了一套50张的水彩风景画“珠江三角洲组画”，其中《春雨后》、《珠江夜月》都被省、县同行认可，是很好的代表作，可惜全



挥毫起笔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与领导、同行在一起



张介先生的一群好“朋友”



在自己的画前



无数次“个展”的一次留念



乐在其中

部都被毁于十年浩劫。

天上的虹霓是如此璀璨，但美丽得并不长久。1958至1978年，顺德人在故乡的绘画活动用“万花纷谢一时稀”来形容和叙述都是切合的。

我生性对绘画的热恋，朋友为我刻章都刻上“画癖”。后来又为大良镇培训美术教师，每晚到凤城中学授课。其间黑夜回程也曾尝过“下街”（跌倒）之苦。惟是那份愿意将自己绘画的技艺献给年轻人的热情，无视一切困难。培训班结束，学员分派到镇属各小学后，又迎来被聘任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顺德分校副校长之职。

北京“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在全国各地发展分校。顺德于1986年也顺应办起来，学员有三百多人，来自各镇。为方便学员，分为大良、容桂、杏坛、均安、北滘五个面授班，还加上属于南海、阳春、电白等地来的八个学员。我负责容桂、杏坛、均安和八个外县来学员的国画辅导。工作够重的，备课、往来奔波，每星期面授课后带回的学生作业，一个班三五下不等，四个班就要批改一百多份，外地学员批改后还得寄发，更艰苦的还是1989年辅导毕业创作，不但要增加面授课时，而且还要把学员搞复制画的水平一下子扯上到自己造型的创作画上。除了容桂学班较顺利外，均安学班80%的学员创作，我要逐个面对面修改后，要他们再画，个别还要三四次。幸好谭志源老师及时赶到，杏坛学班就由他顶上了。

毕业典礼朴素的热闹，我坐在前排听校长总结，面前走过的学员都热情地叫张老师，这真是对我最好的酬报。当三年两大副校长兼国画系主任，没有收取校方分文，还自掏腰包乘车往来。北京总校评我为优秀教师。

1989年干完函授大学工作，又迎来中国老年书画会的任务。中国老年书画会顺德分会，后来改称晚晴书画会，是经过北京老年书画会领导层与毛润添同志筹划，经顺德领导赞同成立的。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历了十二年。基本成员是离退休干部、教师。分书法、国画两部分活动。国画又分第一组和第二组，我负责国画第一组的辅导员，逢星期二辅导一上午。

人生第一次辅导“大学生”，言之大；其大有三：一是年纪大，嫩的五十五，老者近八十；二是街头大，局、院、校、行、区的领导都有；三是胆子够大。但对画，他们中80%以上未沾边的。自命绘画传道士的我，考虑过一些方法，如从执笔起，怎样是中、逆、侧、散锋入手；又从使用宣纸性能入手；从白描写实入手；又插入讲近大远小的简单透视原理。又或者让他们“又偷又抢”模仿别人的画等等，总之虽不算完全失败，正确说是效果欠佳。于是我又调整思维，先找寻老年人的特质：一

是老年人学新东西（指未学过的）普遍自信心较低，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手脚不灵，思维亦钝了；二是怕别人说他想做画家；三是心急，力求吹糠见米。客观上还加上个性基础文化的不同。针对上述情况，实事求是地宣示我和他们共同学习的信心。一、不言而喻他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见地，对新的学习有更大理解力；二、敦诚地宣示轻松，他们已完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份正业，画画是第二件工作的开始，是自己离、退休生活前进和提高的佐证；三、写写画不管水平如何它总能提高人的精神素质，驱逐无聊，取得愉快的享受；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缺陷应及时示范讲解，不怕重复累赘。成绩好的个别研讨，成绩差的正课前后加餐，不可能像学校一样齐步走，辅导者对学员不强加自己的观点。对有些学员入组前学过一些错误画法就减息、费多点力帮助他们走好第一步。共同的学习又加上共同的生活，把生活和学习自然地扯在一起，我们常集体参观大的小的画展，短足写生，近地旅游，和各地文化站座谈，饮早茶。感情就在这些活动中沟通 and 了解，生活和学习的情趣就在这些小事上前进和丰富，你教我，我又教你，成了我们这个集体的家常，谁都不计较那些虚无的面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客观事实。“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十不稀奇”，只是道明社会的逐渐转化，当然也是社会一角的现实。在我接近的老兄弟姐妹中，我喜欢提出我的观点；我觉得生命是在于有意义的运用，而不在于无意义的保留。残疾人运动会的健将们就是榜样。我这样说不虚地提高境界，因为组内搞画展，自谦者常表态说：好！“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啦！”我内心常感到“晚晴”这班老兄弟姐妹他们既明亮理智也有蕴存温馨的感情。一位老院长从他参加晚晴画会以来，洗颜色碟、洗笔、打水以备上课，从没有歇止过。无言的朴素劳动，应是对我的鼓励，更应是对我的教育。“晚晴”就是晚情！那管日落何时。



家里



旅游

张介叙述对社会的投入：



“梅”前留影



画鸡

别人说画画是练气功，我自己有点怀疑，有些人又说绘画、书法会让人长寿，其实无他的，就是一个心境问题，心境不好，就没办法长寿。就是说人需要乐观，乐观比悲观的人长寿。我是离不开社会的，我经常跟我老伴说，如果我不投入社会，社会就会忘记了我！如果这样的话，跟死是差不多的，对吧？因此，我现在的生命是非常依靠晚晴书画会的一群男女长者。一群美术爱好者走在一起，就多了许多共同语言，谈笑风生。由于没有介蒂、没有界限，说错了的话也没人责怪，没人挑剔。说对了的话，大家都齐声说仿效，这就是非常好的集体，我经常投身到这里。

